

刊》1982年第3期),金太顺《元代“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求是学刊》1981年第3期),景爱《跋出土元代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南开学报》1979年第2期)。另外孙秀仁、孙长庆《“塔察国王”与“管民千户”》(《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3期)对1978年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出土的一颗蒙古国时期的官印进行了考察。这颗官印的发现对研究东道诸王斡赤斤家族在东北的统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七)其他问题的研究。一些学者还对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交通、驿站、经济、宗教等问题进行过考察。主要研究成果如下:箭内互《元明时代的满洲交通路》(《满洲历史地理》第2卷),郭毅生《元代辽阳行省驿道考略》(《北方论丛》1980年第2期、1980年第4期),丛佩远《元代辽阳行省的农业》(《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白晓清《元代黑龙江地区的屯田》(《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元代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年第2期)、《元代黑龙江各族工商业述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4期)、《浅谈元代黑龙江地区的站赤》(《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3期)、丛佩远《黑龙江下游地区古代的狗国与狗站》(《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宗教》(《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元代东北史的许多具体方面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以往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和薄弱环节。第一,偏重于具体问题的考证,而对元代东北在整个元帝国政治军事体系中的地位认识不足。同时我们也需要将元代东北的一些具体问题放到元代东北统治的全局中重新进行考察。第二,缺少对元代东北统治的系统论述。如:元代东北统治的阶段、主线和特点,元代东北行政、军事、监察机构的建置情况,元代东北统治对后世的影响等。

第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三月底在杭州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美国、日本、韩国等海内外115名专家、学者相聚一堂,从历史学、教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野,就科举制度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科举研究正在形成为一门多学科参与的新兴学科——科举学,将中国科举史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本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会者提交给大会的论文总数达90篇以上,这是十分可观的学术成果。会议论文反映出科举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下面试作介绍。

其一,与会者从宏观上讨论了科举与古代、近代中国的关系。大家认为:科举考试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它不同于动刀动枪的宋金、宋蒙战争,但它却是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发动起来的一场持久的“全民战争”,主宰着千百年来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涉及到千百年来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科举与中国,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人要透彻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必须要研究科举与中国。外国人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性格,同样

必须研究科举与中国。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写过一部影响几代美国人的名著《美国与中国》,我们应当写几部大书《科举与中国》、《科举与世界》,让世界从中国历史深层的制度与文化视角了解近代的中国、当代的中国。即便如中国近代文化和当代考试制度,无不与科举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 科举文献的研究与利用,有了新发展。研究西夏科举,最困难的是科举史料匮乏。这次会议上,有学者利用《俄藏敦煌文献》中的西夏黑水城文书研究西夏科举考试内容,并与唐宋科举考试内容进行比较研究,促进了对西夏科举制度的了解,同时唤起了学者对新材料的关注。又如利用《清代朱卷集成》原始试卷、《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所收“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等第一手科举文献,有力地推进了进士研究、家族研究、区域经济、文化研究的深入。

三 对科举史的研究,这原是每届科举年会的重头戏,这一次更呈现全面开花的新气象。先从科举断代史研究看,有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甚至太平天国科举的研究,特别可喜的是,像西夏、辽、金、太平天国这些科举史料匮乏的朝代和特殊历史时段,以前问津的学者较少,这一次,则有像《太平天国女科考释》、《试论金代科举制度》等佳作提供给大会。此外,以前关注较少的一些科举制度中的问题,如科举经费(包括考试经费、贡院修建经费)、宾兴等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有了深入的探讨。科举史的区域研究,面更广,边陲地区台湾、云南等,甚至国外的越南黎朝时代科举,也进入了本届学术会议的热议话题。

在科举制度研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科举术语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提交会议的《破白与合尖》及《免举考释》两篇论文,是关于科举术语的专门研究,做得很深入,这两篇论文需要对历史制度与古汉语扎实的功底,小中见大,其学术价值很高。它不仅仅是对科举术语本身的阐释,还体现了科举制度内容演变的历史轨迹。与会者认为,科举术语研究是一个关乎科举制研究不能绕开的、前景广阔的学术方向。

四 关于科举制度影响的研究,也是会议的重要内容。如《科举世态与〈李娃传〉的思想走向》、《试论科举变革与近代中国文化之演变》、《国家、科举与家族》、《清前期江南家族建设、市镇发展与举业繁兴》,等等。科举与文学、科举与教育、科举与国家、士人、家族、科举与城镇建设,以及对科举与当代考试制度关系的探讨等,成为本届研讨会十分关注的讨论课题。

五 构成科举学重要内容的关于科举观的研究,已成为专家学者日益重视的学术方向。如《为科举正名》、《清代科举六十年回顾》、《近代文化思潮与20世纪的科举观形成》、《考试情结》等,都是这方面的新成果。

六 坦诚的学术交流与不同观点的交锋,凸现了本次会议浓郁的学术气氛和无拘无束的学术风气。比如关于“新科举学”的提法妥当与否?要不要为“科举平反”?和“科举变革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到底该如何评价?儒学思想破坏了科举公正性吗?等等问题,与会者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交锋,这对启迪思路,推进学术研究极有帮助。

七 大项目、大工程纷纷亮相与出台。如:(1)浙江大学龚延明与祖慧教授合撰、傅璇琮主编的《宋登科记考》的出版,这是填补了继清代道光十八年(1838)徐松撰成唐五代《登科记考》后,170多年无《宋代登科记考》跟进的空白。为宋代科举、宋代各种专门史的研究,集中提供了科举基础研究文献。(2)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持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

辑的编纂与出版,为历代科举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这套《丛刊》还将继续编纂下去,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献整理事业。在本次会议上,以上两个大项目主持人都作了汇报,有助于科举学界沟通信息。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科举研究的新成就。

总之,新观点、新思维、新材料、新成果,正在提高科举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平。本届学术研讨会充分显示了跨学科研究优势与威力。

这一届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同于以往,如果说以往的研讨会是民间自发组织的,那么现在是有了一个学术组织——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专业委员会,来联络、协商、率领这一场学术研究的“总攻”。可以期待:今后,我们这一支学术实力雄厚、跨学科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探索前景十分广阔的学术队伍,将会以更勃勃的生气、更充满生命活力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取得更加丰硕的业绩。

(浙江大学古籍所 龚延明)

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7日至8日,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在安徽淮南市隆重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河南、山东、安徽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74篇。与会学者围绕淮河流域历史、地理与考古,淮河文化的概念与内涵,民俗艺术,历史时期淮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淮南子》与道家,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现将会议内容概述如下。

一、淮河流域历史地理与考古方面的研究。本次会上这方面仍然是讨论的重点。考古方面提交的论文近10篇,历史地理方面有20多篇。由于近年来淮河流域的考古有较多的发现,考古学者已提出了“淮系文明(化)”的概念,并且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次会议上朱光耀、阚绪杭等人根据淮河中游新石器遗址出土资料讨论了该时期的人地关系。徐大立副研究员通过对双墩遗址出土的红烧土遗迹和部分刻划符号的辨析,认为当时除了干栏式建筑外,还存在两面坡形的地面房屋建筑,表明在7000年前,双墩先民不仅能够依据气候环境和地形地貌来确定居住形式,而且其间已经蕴含着氏族部落内部存在的原始崇拜、宗教信仰、组织分工、等级差别和经济形态对建筑形式的不同需求。另外几位学者就新近发现的蚌埠双墩遗址春秋墓葬形制、土偶现象与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中的蚌器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部分学者还就怀远禹会村遗址、固镇壕城遗址、六安楚墓等的最新发掘情况做了介绍,引起与会学者的兴趣与热烈讨论。

历史地理方面,陈立柱代表课题组就古代淮河的多种称谓与定名问题作了发言。他认为,古人称谓淮水为“江”,有时又曰“江淮”,一如称名汉水、湘水为江汉、江湘一样,江者南方民族大水之谓也。可以看出,淮河流域古代是华夏、东夷与江汉三大族团争夺与汇聚之地,名称的变化充分体现这一点。因此,淮水之名称音读的变化,体现的是这一地区古代民族迁徙盛衰的历史变化与文化上的融通汇合。王大庆针对《明史·河渠志·黄河》有关古代运河的记载,参